

厦门大学吕振萬书籍出版基金

“厦门大学吕振萬书籍出版基金”是由吕振萬先生捐资 100 万港币创立的，用于资助厦门大学教师出版他们的专著及优秀教材。

吕振萬先生 1924 年出生，祖籍福建省南安市水头镇。1945 年毕业于中国朝阳大学（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攻读经济学与法学。毕业后赴海外开拓事业，取得巨大成功。他不仅事业有成，而且在经济学及工商管理学学术上具有独特的理论见解，体现了现代大企业的先进管理思想，立有专著，发表了不少很有深度的文章。被聘为厦门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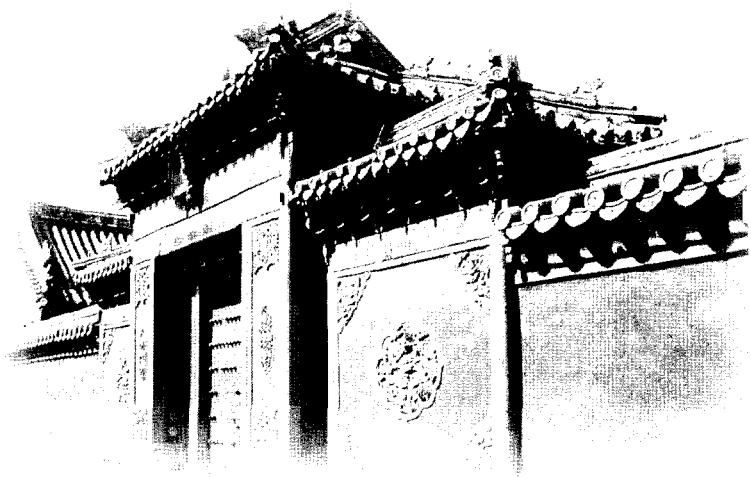
吕振萬先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改革开放伊始，他就率先回国投资，先后在国内创办了 30 家现代化企业和成片的综合开发区，潘龙开发区的成功就是个典范。

吕振萬先生不仅是一位兼有现代化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艺术的企业家，而且不忘造福社会。他很重视企业管理和经济效益，但他更重视人才和关心教育事业，在福建省捐资近一亿港币，为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明代官手工业到 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

*Cong Mingdai Guanshougongye
Dao Zhongguo Jindai Haiguanshi Yanjiu*

陈诗启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目 录

代序:我的史学研究经历 (1)

上篇 明代官手工业研究

一、明代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官手工业的演变 (3)

二、明代的工匠制度 (49)

三、明代的灶户和盐的生产 (84)

中篇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一、鸦片战争前的买办和近代买办阶级的产生 (129)

二、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
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 (152)

三、近代中国有没有民族市场的形成 (186)

下篇 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

一、中国近代海关的“国际性”和洋员统治的演变 (205)

二、中国海关的近代化设施及其对清政府的改造 (237)

三、海关监督和外籍税务司的畸形关系 (275)

四、英商否认海关洋员关于违章处分案件的管辖权
和《会讯船货入官章程》的制定 (284)

五、中国海关与引水问题 (308)

六、从总税务司职位的争夺看中国近代海关的作用 (326)

七、清末税务处的设立和海关隶属关系的改变 (346)

八、迈向关税自主的第一步

- 广东国民政府开征二·五附加税 (371)
- 九、1929年国民政府的海关改制 (391)
- 十、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税行政改革 (404)

附录

- 一、《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获奖简介 (425)
- 二、《历史研究》鼓舞了我的中国海关史研究
——《历史研究》创刊40周年题词 (432)
- 三、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中国海关史第三次国际学术
研讨会欢迎宴会上的讲话 (438)

代序：我的史学研究经历

我于1915年2月出生于福建省德化县戴云山崇山峻岭中的赤水镇。现在已是90虚岁了。

赤水镇是个僻陋的小市镇。我的家乡苏岭村，在我小时，村人都是以种地、制瓦为生，只有我的父亲在镇上经营一家出售百货、杉木的小商店。全村似乎没有几个受过教育的。全镇只有一个书塾，一个半书塾的小学——锦水小学。

在赤水镇，我接触到的是据守镇上的“民军”（地方武装）、小同学、小朋友、镇街上的小商人以及肩挑背负的小贩和农民。我连大学的名称都没听过，风气的闭塞，由此可见。

父亲虽然经营小商店，但是小商人在当时的社会没有地位。当他看见我在小学时会写一笔比较像样的毛笔字时，认为我有培养前途，希望我长大当上一官半职，村中父老也盼望我“成器”、“出人头地”，光耀乡里，也光耀家庭。我在这样环境的熏陶下，小小的心灵，就



中为作者生母李瑞华，
右为作者（6岁）

种下了“出人头地”的种子。其后，一直追求“出人头地”的前景。

父亲经营的小商店，日趋兴隆，引起了邻近的“民军”首领的觊觎，终于被绑架，而后倾了家荡了产，才赎了回来。从此，家道中落。

父亲看见赤水镇是四周“民军”争夺的对象，意识到不是久居之地，乃于1929年春迁往邻县永春，定居下来，我也就在永春崇实学校读初中。

父亲迁居永春后，被一家友人合资经营的杉木店——大川公司雇充“经理”，这个经理下面只有一个“伙计”。可见这家公司，小得可怜。父亲每月收入，仅敷家用，但仍勉强送我到厦门，进集美师范。1935年，我师范毕业，再也不能进入大学，只得回到永春，接受母校崇实中学赖校长之聘，任小学部主任。当时，我才20岁，青春的热情，驱使我努力办学。一年以后，赖校长看见我办学有成绩，把我提升，兼任初中部一年级国文教员。当时，私立学校教员，待遇菲薄，生活清苦，地位也不高。因此，我决计争取继续升学。

1937年夏，厦门大学由私立改归国立，学费锐减。我决定以积累的微薪，投考厦门大学历史系，幸被录取。于是怀着“鲤鱼出大溪”的幻想，10月，负笈奔向厦门。那时，正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厦门处于前线，日本战舰在厦门港外游弋，战云密布，泉、厦备战森严。但我升学心切，一无顾虑，毅然奔赴暂迁鼓浪屿（租界）的厦门大学报到。12月下旬，我跟着学校迁往闽西长汀。依靠领取助学金、奖学金以及在中学兼课所得，度过了四年勤苦的大学学习生活。

1941年夏，我大学毕业，先后在国立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国立第一侨民师范任教。当时，国立学校教员待遇较优，地位也较高；但我仍不满足，在两三学期间更换了几个单位，老想爬上“出人头地”的职位。当时不安于位的情绪，可见一斑。

1942年秋，我得到厦门大学萨本栋校长的推荐，在长汀豪绅

的竞争中,竟然出任长汀县立中学校长的职务。这是我大学毕业以来获得的最高职位。我全力以赴,在厦大肄业的同学中,审慎选聘了吴厚沂、潘懋元、杨民坊、陈奕尚、谢慎初、孙乙尘等十多位优秀同学任教员,又得到梁超鹏(集祥)同志的全力支持,在1943年冬季全省初中学生会考中,取得最佳成绩。我颇感自慰。

但是,正是在县中校长任职期内,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我发现:第一,我对于复杂的人际关系,不善应付,觉得厌烦;第二,对于繁剧、机械的行政工作,觉得浪费精力、浪费时间,不愿从事;第三,办行政,遭遇困难、挫折是常事;但我一遇困难、挫折,就灰心丧气,缺乏坚持应付的勇气。这些缺点,使我充分认识到,我的性格不适合于搞行政。基于这一认识,我当机立断,做出了从业方向的转变。

我在大学肄业时,羡慕大学教师的教研工作。因为此项工作比较单纯,稳定、清闲,特别是国立大学,不受地方政府、地方社会的干扰,可以安心工作。因此,萌生了进入母校从事教研工作的念头。

1945年5月,我有幸进入母校;但当时我不具备担任大学教



研工作的条件,只得暂时担任行政繁剧的总务处庶务主任的职务;一面争取时间,全力充实历史知识,创造条件,以便伺机转入历史系,专任教研工作。

可是,学校却把我作为行政人才使用。我前后在新生院训导主任、教务处教导主任以及总务处秘书的行政职务上打滚了七八年,精神上极端苦闷。但我在履行行政职务中,却争取到系外中国通史的教学任务。我极力抓紧时间,认真备课,改进教学方法,把搞好教学工作作为首要任务。

1953年,厦大进行大规模教学改革,全面学习苏联教学方法,历史系课程激增,教学人员不足。组织上认为我努力教学,有培养前途,免去了我的行政职务,调任历史系讲师,专任教研工作。至此,我夙盼多年的大学教研工作得到最后实现。我喜出望外,从此以后,矢志不移从事历史教研工作,一心一意地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称职的大学教师;至于行政职位,则视如敝屣,不再有任何追求了。经过了两年多的刻苦努力,我的教学经验在厦大《论坛》发表,并转载于教育部刊物。我的《明史讲义》被教务处作为交流教材,在各大学进行交流和使用的。

从1954年起,我一面从事教学,一面在编写教材的基础上开始研究工作。我一进入历史系,系领导就分配我担任中国通史中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两项教学任务。我战战兢兢地全力做好课堂教学,首先是做好撰写教材工作。我在写作教材过程中重视:一、努力学习经典著作,作为分析史实、史料的指导;二、尽量吸收各种教材的优点;三、教材内容尽量做到少而精,但又不破坏严密的系统性;四、引用学术界新的观点。这些做法,不但提高了教学质量,而且为历史研究锻炼了思维能力和研究能力。通史教学,提供了我广阔的研究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有利于搭建更高的高台。

我第一篇正规的史学研究论文是《明代的工匠制度》。撰写这篇论文时,我运用了撰写教材的体会和心得,收到较好的效果,结

论也较完满。这篇论文得到专业刊物《历史研究》的采用，并为尚铨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转载，三联书店 1957 年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也特约撰写官手工业方面的著作，我以《明代官手工业的研究》一书应约，是书于 1958 年出版。这个尝试说明我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础，给我很大鼓舞，成为我从事历史研究的动力。

从 1954 年直到现在的 40 多年中，我一直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从未间断过。我的历史研究前后大约经历了下面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54 年到 1958 年，结合明清史教学把研究重点放在明代官手工业研究上。明代官手工业的研究，向为学术界所忽视，可以说是个空白点。我计划填补这个空白点。明代的官手工业，内容相当广泛，我决定从官手工业的劳动力——工匠问题作为突破口，然后按其内容分为若干专题，逐步开展，最后汇集成书。

明代前期的官手工业是前代官手工业的继承。它一直是封建政府主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它是中国封建经济重要的构成部分。它的发展是和整个封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整个封建经济的发展来寻找官手工业演变的线索；另一方面从官手工业演变过程反映出封建经济发展的水平。

封建经济，基本上是自然经济。在自然经济统治下，交换是微弱的，商品生产不发达，“具有地主世袭领地之闭关自守性和自给自足性”。中国历代王朝建立的官手工业，正是自然经济“闭关自守性和自给自足性”的体现。这是和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但是在自然经济统治下面，社会生产力仍然不断向前推移，商品货币关系也跟着不断发展。封建社会内部的这种变化，必然影响到官手工业的变化。明代前期的社会，农业生产到达繁荣的境地；某些手工业部门的生产力也超越了前代的发展水平，商品货币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同后期比较，这种发展还是有限的，也

就是说,前期的经济,量的方面,虽然是急剧的,但是质的发展则不显著。这种情况,反映到官手工业上面,是官手工业劳动力的提供仍然采取从前的劳役制,物料的供应仍以实物为主,整个官手工业保持稳定发展的状态。

到了英宗正统元年,南畿各省漕粮改征货币,直到嘉靖、隆庆到万历(1522—1615年)的93年间,中国封建社会商品货币关系才到划时代发展的阶段,小生产者的地位才有一些分化。这个具有变革的历史时代,促使官手工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就是提供官手工业劳动力的制度——工匠制度,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即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劳役制逐步过渡到工役制;但是这种过渡是缓慢的,有其局限性的。

以上是我研究明代官手工业取得的一点微薄成果。由于这些成果,在南开大学主办的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我有幸应邀参加。1987年,我向香港大学倡议主办中国海关史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获得王赓武校长的欣然同意,也是得力于这个成果的影响。直到现在,中国经济史学会等三个单位的联函中还说该书“为后来者研究明代官手工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并成为后人研究明代官手工业案头必备之书”(2003年12月23日函)。

第二阶段,1959—1966年。1959年历史系领导调整了我的教学任务,免去了我的明清史教学,专任中国近代史学教学。跟着教学方向的转变,我的科研也朝着中国近代经济史方向转变。由于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指导理论了解得不够深刻,资料比较生疏,所以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不多;但我在《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发表的《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一文,却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史论文集》先后转载。我在《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发表的

《鸦片战争前的买办和近代买办阶级的产生》一文也为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续编)》转载。在《中国经济问题》1952年第5—6期上发表的《中国近代有没有民族市场的形成》，是参加当时争论的论文。其论点也由《新建设》1962年第12期《中国历史上民族市场形成问题的讨论》摘录刊载。这一阶段，可以说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添了一些砖瓦。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开始我便被打为“牛鬼蛇神”。从此以后，我便像只破船似的在浩瀚的大海中飘浮着，我的研究工作停顿了五六年。

第三阶段，1972年11月至1979年。这时，我是作为定罪的人在历史系资料室进行管制的。“革命派”认为我已被彻底打倒了，永无翻身之日，因此，不再来监管了。资料室负责人何天华同志同情我的遭遇，从不歧视我，而且经常要我提前下班，提前吃饭，甚至不分配我任何工作。我在资料室简直是个闲置人员，有完整的空闲时间。我的家人都在家里赋闲。我对“四人帮”篡改历史、伪造历史的罪恶行径，极端不满。于是，决定全力以赴，如实地收集历史资料，运用历史资料，从事历史研究工作。这是不满情绪的一种反应。我那时才五十多岁，纵再管制十年，也不过六十多岁，还有一些余年。基于此，我决定立即振作起来，咬紧牙根，忍辱负重，恢复研究工作。我回忆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专题研究的教学中，发现中国近代的海关，是个奇特的机构。它是中国征收对外贸易关税、监管对外贸易的机关，但却为外籍税务司把持。外籍税务司封锁海关行政和所有档案，外人不得研究或阅看，因此，学者无从研究，造成百年来学术界没有一部完整、系统的中国近代海关史。我决定乘此期间，利用空闲时间，填补这个空白点，把撰写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近代海关史，作为持久的奋斗目标。于是，我以资料室人员的身份，出入图书馆各书库、教师阅览室，在阅览室得到石翠英同志的照顾，查阅、借用有关书籍。然后在资料室进行摘录，

分段、标点,乘星期六准假回家过夜机会,携回家中,由爱妻分发儿女抄写,并亲自校对。第二星期换了一批书籍,照样办理。我就是这样默默地刻苦工作了六七年。正是这样既无名又无利,又冒着风险的工作,为我日后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牢靠基础。

1979年,我从资料室解放出来,计算积累的资料,达300万字,整个近代海关演变的基本线索也显示了出来。这是我和家人在患难期间所得的成果。我为坏事变成好事而深自庆幸。

也就在这时,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向着中国近代海关史的研究荒漠迈步前进。

第四阶段,1980至1985年。1980年,我恢复了教研工作,并得到组织上重用,我以愉快心情投入中国近代海关史论文的写作。我的第一篇有关近代中国海关史论文寄给《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部很快地回了信。回信要求我再写有关的论文,并说列强控制下的海关,是值得研究的课题,编辑部“有意提倡”。我喜出望外,认为我的研究方向走对了,因而坚定了研究信心。为系统综合研究近代海关史,我特倡议厦门大学与中国海关学会合办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1985年,研究中心在厦门大学成立,我被任为主任。



第五阶段,1986年至1992年。研究中心成立后,我已届退休之年,遂申请退休。之后,全力领导研究中心工作。我的工作主要是:

- 一、巩固和发展中心的组织;
- 二、收集海关档案资料;
- 三、编辑一部海关常用词语的英汉对照;
- 四、翻译出版外国的有关著作;
- 五、撰写一部比较完整和系统的《中国近代海关史》;
- 六、发动举办中国海关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 七、和外单位合作编译出版海关档案;
- 八、出版《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动态》,报道研究中心活动情况;
- 九、定期派员巡视各海关,协助各有关志的编写。



关于研究中心的工作情况,阮芳纪编审的《近年来中国海关史研究评述》一文作了详尽的评估。此文提交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办的中国海关史第三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收入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术集刊《中国海关史论文集》(1997年版)。

研究中心成立后,我倡议、主持了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

一、1988年,香港大学历史系与亚洲研究中心主办中国海关史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由霍启昌博士主持。

二、1990年,由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牵头、《历史研究》编辑部、《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中山大学历史系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五个单位联合主办,由我和阮芳纪分任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聘请费正清教授、王赓武校长为顾问。



三、1995年,中国海关史第三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由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办,由吴伦霓霞、叶汉明两位教授主持,聘请许倬云、

我、陈学霖为顾问。

参加历次研讨会的有美国、加拿大、日本、香港、台湾、大陆有关的专家学者。

1987年以后的两三年间，我以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专业人员代表研究中心访问了全国15个海关，各大海关如深圳、上海、天津、大连等都访问过，主要是协助各关编写关志。我还查阅了南京、上海、天津、广州、沈阳等八个档案馆、图书馆的海关档案。为了使海关的专用名词和常用语英汉对译标准化和规范化，我发动研究中心同仁辑录了一套三册中国海关史研究的工具书，并由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中国近代海关常用词语英汉对照》一书，由我担任主编。此外，为了交流国外关于海关史研究成果，我还倡议组织翻译出版国外有关中国海关史著作，如《李泰国与中英关系》、《赫德与中国海关》、《赫德日记》第一卷、《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等。还从魏尔特编的《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七卷本中亲自选译了20多万字的重要文件。这些译本的翻译出版，对于加速中国近代海关史的研究产生一定的作用。

第六阶段，1993年到现在。1992年，我因年老体弱，为集中力量撰写《中国近代海关史》专著，辞去了研究中心主任职务。这时撰写专著条件已经成熟，一、资料大体具备；二、一些基本问题通过了三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讨论，有了大体的了解；三、通过历次的讲演和论文的写作，中国近代海关演变的线索及其内容，大致了解。因此，撰写工作进行顺利。大约一年时间，我写完了前半部晚清部分。本来打算定名为《中国近代海关史》上册；但是想到自己已年近八十，能否完成下册，殊属疑问，索性把“上册”改为“晚清部分”；万一写不出下册，总算告了个段落。

我有幸活到现在，我的健康还能支持繁剧的写作工作。因此，把《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交给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之后，继续从事民国部分的撰写；但是民国部分似乎从来是个空白

点,几乎每章每节都得从头写起。因此,进展很慢,单就第五章一章就花了几个月时间。直到1999年,才最后定稿,定名为《中国近代海关史》(民国部分),并经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9月出版。

《中国近代海关史》是国家“七五”规划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清部分于1995年获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1999年,复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颁发“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国际互联网称是“史学最高奖项”。阮芳纪编审认为“该书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这个阶段我国海关史学界的代表作之一”;《现代海关》1998年第2期王意家教务长也撰文评述:“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海关史的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海关史的研究在历史研究中重要地位的确立。”全书出版后,于2001年,经教育部委托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会议审定:《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和民国部分,入选“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博士、硕士的“研究生教学用书”(教材),2002年,又获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和第二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先后获奖七次。可以说填补了这个空白点;但是平心而论,它仅是搭起初步框架而已,还谈不上完备、系统。要做到完整系统,尚须继续努力,进行深入的探讨,加以充实。特别需要海关附属机构各专志研究结论的补充。这恐怕不是我老朽能够完成得了的。


我对中国近代海关史的研究,从1972年开始到现在已整整31年了。在这31年中,我未曾片刻离开过。我将作为一生事业继续进行下去。

现在,躬逢盛世,生活稳定,健康基本稳定,又逢退休之年,正是学术研究的大好机会。我余生无多,当加强保健,多活几年,为学术领域多添些砖瓦,隐于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以终老。

本书端赖厦门大学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薛鹏志同志悉心整理



厦门大学报



中共厦门大学委员会主办
厦门大学摄影编辑部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35-0807/G
E-mail: xdb@xjmu.edu.cn
http://www.xjmu.edu.cn
2004年2月25日
第53期
本期四版

祝贺陈诗启教授执教65周年暨九十华诞

数载耕耘桃李满园
海内史研独具慧眼

王东杰 敬
2004年2月

祝陈诗启教授

贺陈诗启教授执教65周年暨九十华诞

德高仁厚遂以长寿
贤达心清得以功成

王东杰 敬
2004年2月25日

祝陈诗启教授